

專題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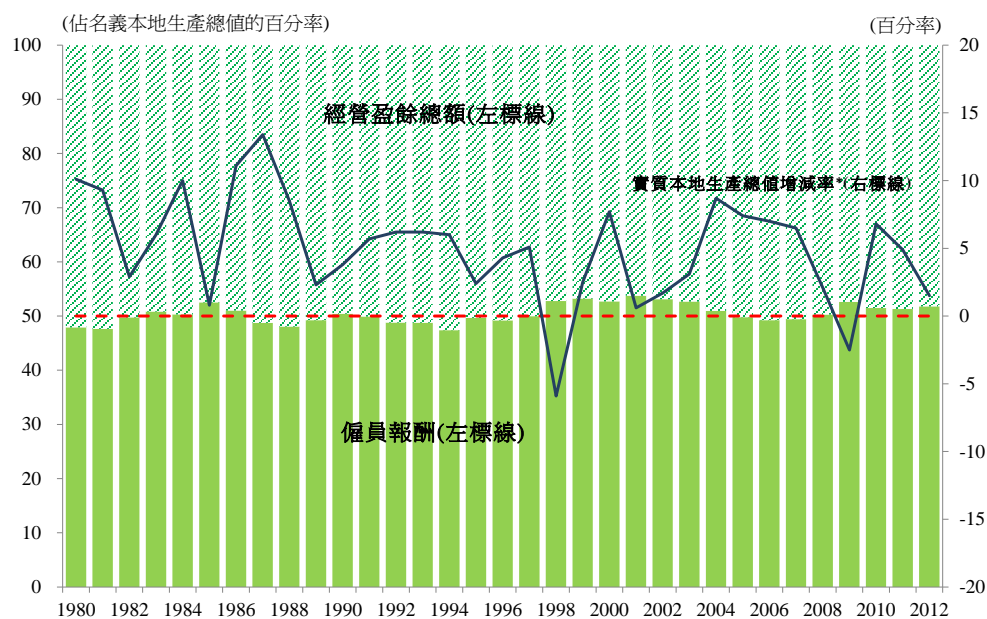
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

本地生產總值是量度一個經濟體的所有居民生產單位在一段指定期間內的生產總值。從收入角度來看，本地生產總值代表一個經濟體內的居民生產單位，其生產要素(即勞工、資本及企業家貢獻)的收益總和，作為他們從生產貨品和提供服務所獲得的回報。要素收益¹¹包括居民生產者的「僱員報酬」及「經營盈餘總額」²²。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其計算方法為僱員報酬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通常用作一個經濟體內勞工及資本收益分布的粗略指標。雖然這個比率的長期穩定性曾是經濟增長的「典型現象」，但近期有實證研究顯示，過去二十年間這個比率在很多經濟體均出現顯著跌幅³。本專題嘗試通過分析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的數據，以識別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主要特點及決定因素。

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特點

有別於很多其他已發展經濟體，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間雖經歷起伏，但未見明顯的方向性變化(圖 1)。一九八零至二零一二年期間，僱員報酬對本地生產總值的平均比率為 50.5%，顯示勞工及資本的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大致相若。事實上，僱員報酬及經營盈餘總額在一九八零至二零一二年期間的年均增長率相若，分別為 9.0% 及 8.4%。總體來說，隨着香港經濟擴張，勞工及資本享有均衡的收益增長。

圖 1：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整體上大致保持平穩



註：(*) 指以市價計算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減率(右標線)。另一方面，左標線指以基本價格計算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中經營盈餘總額及僱員報酬所佔百分比(詳情見註釋 1)。二零一二年的數字會在取得更多數據後再作修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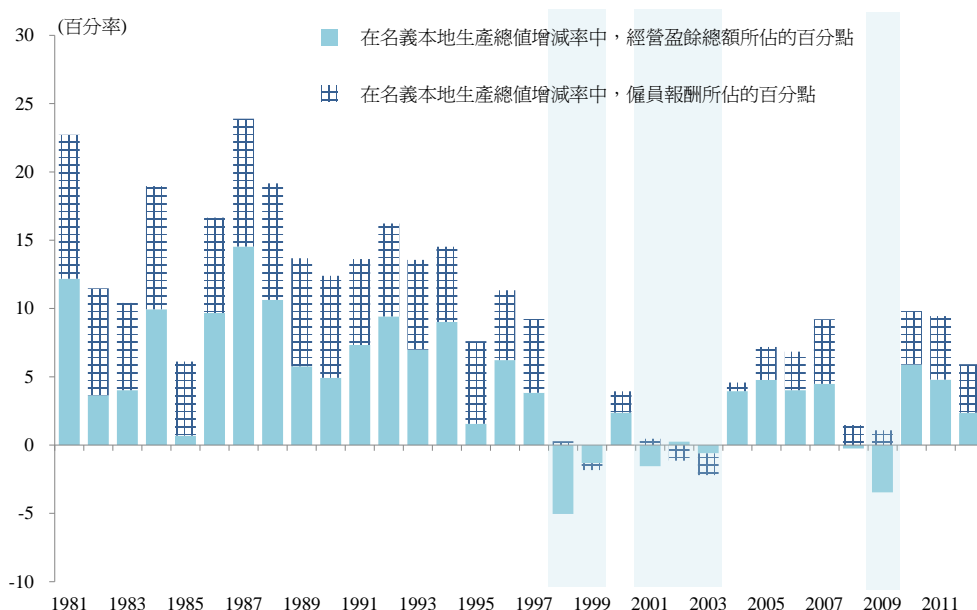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國民收入統計。

- (1) 本地生產總值收入組成部分的數字，取自從生產面編製的本地生產總值估計數字。香港從生產面編製的本地生產總值(「生產稅」包括在內)以基本價格計算。不過，為配合分析需要，本專題所討論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數列剔除了「生產稅」。
- (2) 僱員報酬指工資及薪金、僱員實質利益費用以及僱主為僱員所提供的社會保障費用的合計數額。經營盈餘總額則指從事生產活動的資本及企業家所獲得的回報。
- (3) 舉例來說，《經合組織就業展望》(2012)指出，自一九九零年代初至二零零零年代末，在經合組織國家的國民收入中，勞工收益所佔比重的中位數由 66.1% 跌至 61.7%。

專題 6.1(續)

從圖 1 可見，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經濟下滑時往往上升，反之亦然。這個現象大致可由經營盈餘總額所反映的資本收益對經濟盛衰具有較高敏感度所解釋。舉例來說，當經濟活動減慢及需求轉弱時，經營盈餘總額通常隨即下跌。同樣，當經濟復蘇時，經營盈餘總額往往會迅速反彈。相比之下，僱員報酬的波動卻少得多，而且與其他勞工市場指標一樣，稍為滯後於經濟周期的變化。實際上，在過去大部分名義本地生產總值下跌的年份中，經營盈餘總額均見大幅下挫，只有在二零零二和二零零三年當失業率屢創歷史新高時例外(圖 2)。

圖 2：與經營盈餘總額相比，僱員報酬對經濟波動的敏感度較低



註：為方便參考，名義本地生產總值錄得負增長的年份以陰影顯示。
二零一二年的數字會在取得更多數據後再作修訂。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國民收入統計。

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決定因素

在研究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文獻中，經常論及下列決定因素：全球化(通常以經濟體的貿易開放度作為衡量標準)、金融業的相對規模(反映金融業對整體經濟活動的重要性)、科技水平的提升、公營機構的規模，以及勞工市場制度(例如是否設有最低工資)。

我們參考了上述因素，建構出一個簡單的時間序列計量經濟模型，以測試這些決定因素對解釋一九八零至二零一二年期間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變化有多重要⁴。解釋變數中亦包括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按年增幅，以顧及經濟狀況的轉變。這項迴歸分析顯示，在上述各項潛在的決定因素中，金融業的相對規模與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關係，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表 1 簡述其他解釋變數的影響。

(4) 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被採納為因變數。解釋變數包括貿易開放度(即進出口總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金融業的相對規模(即金融及保險業的總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科技水平的提升(概括地以全要素生產力的年度增減率來代表)、公營機構的規模(即政府消費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是否設有法定最低工資(虛擬變數)。除全要素生產力的數字由內部人員估算外，上述所有統計數字均源自政府統計處。

專題 6.1(續)

表 1：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決定因素

| 解釋變數 | 系數(<i>t</i> -統計量) |
|---------------|----------------------|
| 貿易開放度 | -0.01** (-3.4) |
| 公營機構的規模 | 1.10** (6.4) |
| 法定最低工資 | 2.12** (2.5) |
|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按年增幅 | -0.14** (-2.9) |
| 科技水平的提升 | 0.39** (3.4) |
| 分析 | |
| 觀察數目 | 33 (1980 年 – 2012 年) |
| 經調整 R 平方 | 0.71 |

註：(**) 指顯著水平為 5%。

系數代表解釋變數每一個百分點的變化對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影響(虛擬變數除外)，後者亦以百分點表示。虛擬變數的系數代表在該變數存在的情況下，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比重的變化。

上述結果與其他就各經濟體所進行的研究結果大致吻合。簡而言之，貿易開放度與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成反向關係，可能是由於全球化促使生產線遷移至土地及勞工成本較低的地方，以致海外勞工對本地勞工造成的競爭壓力加劇。另一方面，公營機構的規模和法定最低工資的設立，對於僱員報酬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有正面影響。可想而知，增加政府開支以提供公共醫療及教育等非牟利服務，帶來的主要是勞工收益而非資本收益，因此會帶動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上升。同樣，設立法定最低工資，只要訂於一個不致過度削弱競爭力或嚴重影響就業的合適水平，亦會保障較低技術階層勞工免於工資過低，因而往往帶動僱員的總收入增加。

有趣的是，上述迴歸分析顯示，科技水平的提升與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香港成正向關係，這一點有別於其他已發展經濟體。文獻一般顯示，隨着科技水平提升，機器可以取代人手處理刻板的工作，低技術工人所得收益的比重因而下降。相反，科技進步，特別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和生產程序的創新改進，通常會惠及較高技術工人，因為他們懂得如何運用新科技來提升生產力。就此而言，本港高技術僱員所佔的比重由一九九三年的 20.8% 顯著上升至二零一二年的 36.1%⁵，應足以解釋為何科技水平的提升與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香港成正向關係。

(5) 較高技術僱員包括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一九九三年之前的職業分類未能提供按輔助專業人員劃分的數據。儘管如此，職位提升在一九九三年之前已顯而易見，經理、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員佔所有僱員的比重由一九八五年的 9.1% (最早可用的數據) 上升至一九九二年的 17.3%。

專題 6.1(續)

總結

香港的勞動人口靈活變通，適應力強，素來是本港經濟賴以發展的基石及寶貴資源。儘管香港勞工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滯後於經濟情況的變化，但多年來一直相對保持平穩，可見過去數十年勞工收益與資本收益的增長頗為均衡。至於影響香港勞工收益所佔比重的決定因素，雖然與其他已發展經濟體所見的大致相若，但政府數十年來在教育方面大力投資，令教育程度良好的本地人才數目不斷增加，似乎有助於減輕科技水平提升慣常對僱員報酬與本地生產總值比率所構成的下行壓力。在全球化的洪流之中，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香港必須繼續轉型為高增值的知識型經濟體。因此，本地勞動人口必須持續接受培訓，提升技能，才可以配合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